

Pressed emptiness —— analysis of “osmanthus steamed a small sad autumn”

Han Xu

School of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Osmanthus steam a Xiao Sad Autumn” describes the busy day of “Suzhou aunt” Ding A Xiao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Shanghai, shaping an image of “marginal people in the city” swinging between “urban women” and “rural working women”. Novel with subtle metaphor, rich meaning of image, build a “ding small” living state of fable, illustrates the city edge in the 1940s depressed women spiritual world emptiness and their lack of self cognition, reveals the big era of the bottom of the female survival dilemma, thus points to a special era of its own culture.

Keywords

“urban fringe people”; image analysis; female consciousness; Zhang Ailing

被压抑的空虚——浅析《桂花蒸·阿小悲秋》

徐涵

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桂花蒸·阿小悲秋》记述了从农村来到上海的“苏州娘姨”丁阿小忙碌的一天，塑造出一个在“都市女性”和“农村劳动妇女”双重身份间摇摆的城市边缘人形象。小说用精妙的比喻、含义丰富的意象塑造，构建出一则生存状态的苍凉寓言，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城市边缘女性精神世界中被压抑的空虚以及自我认知的缺失，“空虚”被压抑、释放、再压抑，热冷循环不止。从而揭示出新旧交织的大时代中，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指向一个特殊时代和一代人自身的文化症结。

关键词

“城市边缘人”；意象分析；女性意识；张爱玲

1 引言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传奇”时期一篇较为特殊的作品，发表后仍多次修改。^[1]在大众的印象中，张爱玲的作品似乎总在描述“旧家庭男女间的情爱”，俨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趣的代表。但张爱玲也有不少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例如记录浙东农村见闻的《异乡记》、50年代向新的意识形态靠拢的尝试——《小艾》、赴美后于异质社会环境下创作的饱受争议的《秧歌》《赤地之恋》。这些作品大多写于“传奇”时期之后，而《桂花蒸·阿小悲秋》则不同。1944年，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初版，象征其创作生涯的高峰。1946年，张爱玲再版了这部意义重大的小说集，并加入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五则故事。在以描述旧式大家庭女性生活为主的《传奇》中，这篇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张爱玲走出写作的舒适区，将目光投向

上海底层的一个特殊群体——“苏州娘姨”，描述了娘姨丁阿小忙碌的一天。借阿小的眼睛，作者还塑造了同乡女佣秀琴、阿小丈夫、邻居阿妈、做短工的阿姐等其他底层普通人形象。《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传奇”时期在创作风格、写作对象等方面的一次大胆尝试。

2 人物分析：“城市边缘人”

“苏州娘姨”在吴方言中专指出身苏州的女佣、保姆。在旧上海，她们是勤劳能干的代名词。《桂花蒸·阿小悲秋》的主角丁阿小就是一位典型的“苏州娘姨”，她从苏州农村来到彼时中国最时髦的城市上海务工，雇主是一位住在上海的洋人。“苏州娘姨”和那个时代的无数普通百姓一样，靠双手辛勤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但同时，她们的身份又具有特殊性。首先，她们来自苏州农村，成长于中国传统的农村宗法制家庭，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底色，身上有着无法抹去的农村妇女的气息。另一方面，她们又是传统生活的“背弃者”，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务工。属于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支撑起她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她们面对的思

【作者简介】徐涵（2001-），女，中国江苏镇江人，在读硕士，从事明清文学、清代词学研究。

维方式和文化氛围迥异于农村乡土文化。务工经历给娘姨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变化，她们像是在女性行走了千年的大道上拐弯，走上了一条风险未知的岔路。

阿小和丈夫不是媒人介绍、“明媒正娶”的夫妻，而是在来上海的路上结识并同居，生下了儿子百顺。这样的婚姻是商品经济下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在当时来大城市务工的农村男女中较为常见，传统的婚姻文化受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冲击。然而阿小面对婚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保守的农村社会对这样的婚姻没有明面上的反对，却也无法做到正面肯定。来自农村家人的信件永远只问阿小一人的生活情况，对丈夫和百顺从来不提。来自原生文化的认同的缺失，使得夫妻感情虽大体融洽，但依然有一层暗藏的隔阂，对身为处于婚姻中较为劣势地位的女性的阿小来说更是如此。在听到秀琴说自己婚事的排场，念叨“没有金戒指不嫁”时，阿小便觉得“她的尊贵骄矜”使自己“略略感到不快”。她把秀琴的事特意讲给丈夫听，丈夫同情的微笑却让她生气，“仿佛那全是她的事。结婚不结婚本来对于男人是没什么影响的”^[2]。阿小凭借女性的细腻思维，发现了这一婚姻状态下自己的尴尬与悲哀。然而，阿小并没有沉溺于怨恨，“孩子都这么大了，还去想那些”；男人挣得钱只够养活自己，百顺也推给她教养，但“谁叫她生了劳碌命”。阿小是敏感的，也是现实的。面对传统与现代间深刻的缝隙，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却又用属于底层劳动者的现实精神努力搭建起生活的桥梁。无法战胜缺憾，便用时下真实的生活去填补它——这是阿小这样的底层女性的一种生存智慧。

阿小并不把自己当作完完全全的农村妇女。她将一只缺了角的小粉镜粘在墙上，学都市女子用镜子打扮自己。发型要照时新样式“做得高高的”，打理清爽。她羡慕年轻的秀琴可以打扮成女学生的模样；留心主人们说话的方式，学习“富裕、欢畅”的外国话……阿小对“都市女性”的模仿，一部分是因为她好强、自爱的性格。主人怀疑阿小把家里的面包给百顺吃，瞥了几眼，阿小的脸立刻红了。她对儿子寄予厚望，别人劝她把百顺送去学说书赚钱，但阿小却坚持要儿子读书，以后做正经人、成大器。哥儿达结识的女子中，她最喜欢出手大方的李小姐。秀琴在她面前提自己的婚礼让阿小心生不快，于是她便夸耀起李小姐，紧接着又介绍楼上新婚夫妻结婚的排场。看到秀琴等人啧啧赞叹，阿小也愉快起来，“这样一说，把秀琴完全压倒了，连她的忧愁苦恼也是不足道的。”她拿主人们的财富作自己夸耀的资本，用这些来压倒和自己一样的底层人能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这一特殊心理背后隐藏着阿小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空虚。

阿小渴望都市文化的认同，而这并非全然出于她的主观意愿。在上海打拼的阿小承担着文化冲击带来的压力。她不得不改变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她努力学外语，是因为工

作之一是帮主人接听各种各样的电话。阿小逼尖了嗓子发出的蹩脚外语、在主人面前精心修饰的、套路式的语言；对哥儿达刁钻要求的服从、对他脏乱生活习惯的包容，正是其艰难生存的体现。在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碰撞交融的上海，阿小是迷茫的。为了融入“现代”社会，她努力重塑自己，而这个过程必然充满挑战与痛苦。但当阿小向自己的思维底色寻求支持时，她又会发现，“娘姨”身份让她脱离了乡土生活并转入现代性的劳务关系，她已然从空间和精神上与养育自己的原生文化拉开了距离。为了摆脱身份上“异乡人”和“城市边缘人”的双重困境，阿小只能不断强调自己“都市女性”的身份认知，渴望获得都市人群的认同。她代表了主人，和主人阶级分享同质的文化——在这种虚构出的认同里，阿小隐藏起自己的“空虚”，获得一时的满足。这里的“空虚”，是“异乡人”不得不面对的文化根基的失落，是“城市边缘人”渴求群体归属感而不得的迷惘。纵观全文，哥儿达和其他都市男女并没有接纳阿小，阿小心中认同感的把握与失去，全是自己“幻想”的产物。正如文章开头所描写的那样，“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衙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都市的现代文化留给阿小的只有冷漠的背影。在大都市投下的阴影中，小人物艰难而又坚强地生存着。

3 意象分析：“秋之曲”的冷热

意味深长的意象塑造是张爱玲写作的一大特色，《桂花蒸·阿小悲秋》沿袭了这一传统，意象总体上呈现出动态的“由热到冷”。

3.1 太阳

各式各样的月亮贯穿《金锁记》始终，月亮和非理性、精神性、疯狂等文化概念紧密相关，它代表的是《金锁记》中的女性残缺而压抑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传奇》中的女性心理状况和生存状态大多都是病态的。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堕入风月场中，卖身求爱；《沉香屑·第二炉香》的愫细对欲望有着不自觉的恐惧；《金锁记》的曹七巧心理扭曲，和子女关系不正常，对女儿有着极端的控制欲和毁灭欲等等。月亮意象在《传奇》的其他篇目中也经常出现。

《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题材决定了它的生活气、烟火气。阿小是一个底层女性，她的一天除了工作就是家庭，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没有光怪陆离的交际场。和《传奇》其他篇目不同，《阿小悲秋》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是“太阳”。例如，“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照在房里，像纸烟的烟的迷迷的蓝。”“太阳渐渐晒上身来……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灶白瓷砖的厨房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2]太阳的变化意味着时间的流逝，它是阿小生活中无言的旁观者，静静地凝视着她。“照在房里”、“贴在厨

房里”，太阳的存在和空间紧密相连，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在《阿小悲秋》中起到的作用，类似电影布景中的光源，烘托气氛、情绪，同时宣告故事进入了不同的时间节点。

小说对太阳的正面描写并不多，太阳大部分时候靠它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热度”彰显存在，因此太阳在故事中虽然看似常常隐身，却又无处不在。小说开头就打下了“闷热”的环境基调，文中多次出现对“闷热”的形容。它让公交上陌生人的长衫、公寓的阳台、阿小的衣裳、哥儿达的屋内、整个城市都烘出热度。小说标题中的“桂花蒸”，“桂花”二字指故事发生在秋天，“蒸”对应的就是闷热的天气。在描写太阳下的城市时，作者用了一个特殊的比喻：将城市比作旷野。城市是喧闹、繁华的，旷野是冷寂、空旷的，两者截然不同，张爱玲却让它们分别作为本体和喻体。阿小看似充实的生活中流露出“苍凉”的气息。“蒸”不仅意味着“热”，它还隐喻着一种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个体被困在无处不在的热浪中，想要逃脱却无处可去，只能在闷热中苦苦煎熬。这种“压抑”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是生活中细枝末节的苦闷、涌动的暗流、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要自由地喷薄而出却得不到彻底的解脱，让人窒息。

3.2 冰箱

整篇小说的白天和傍晚部分，都被笼罩在烘人的热度和明亮的阳光下。故事用平和、琐碎的语言，将阿小平凡而忙碌的生活娓娓道来。但时间越靠近夜晚，张爱玲笔下的意象就越来越远离可以捉摸的日常生活，新奇的比喻、将熟悉事物陌生化的描写开始出现，白日里清晰的万事万物开始显露出另一张冰冷疏离、使人惊悚的面孔。阿小生存状态中病态而残缺的一面也随之浮上水面。

阿小和丈夫在冰箱前的对话是夜晚的前奏。张爱玲笔下的冰箱陌生而诡异，它有着“银灰色的肋骨”、“突突跳着的心脏”，是“人体内脏的一张爱克斯光照片”，它喷出的寒浪让阿小鼻子发酸。丈夫站在阿小背后向她发出夜晚的邀请，或者说是完善夫妻间义务的要求，但阿小全程背对丈夫、正对冰箱，毫无欣喜之情。冰箱是阿小自己的镜像，也象征阿小的婚姻。“开冰箱”的动作则意味着阿小自我认知的一瞬觉醒。她和丈夫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们的婚姻更多的是经济上的联系，且婚姻的正当性未得到原生文化的认同。丈夫赚的钱只够养活自己，有时候还要找阿小要钱，百顺也是阿小在教养。但丈夫依然试图通过炫耀式的问话、故作严厉的训话等途径在她和儿子面前建立起身为男人、身为丈夫的尊严。阿小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有着病态的症结。两人的夜晚约会谨遵夫妻生活的公式，出于义务、欲望，缺乏应有的爱情和温情。阿小就像冰箱一样，将对情感的渴望深深冷藏，但她的心依然能感受到痛苦。打开冰箱门的同时，和丈夫的对话将病态的婚姻生活展露在她面前，在镜像中她自

身的尴尬和悲哀被赤裸裸地解剖出来，强迫她面对使人“鼻子发酸”的“寒浪”。这里的“寒浪”，正是阿小生活中被冷藏、压抑的“苍凉”。

3.3 暴风雨的夜晚

张爱玲笔下富有文学性和现代性的陌生感在夜晚的暴雨中达到了顶点。“痛楚的青，白，紫，一亮一亮，照进小厨房，玻璃窗被逼得往里凹进去”，自然力量的强大被渲染得淋漓尽致。暴雨阻止了阿小的赴约，并让她猝不及防地拥有了“自由”。整个白天，阿小都围绕着主人、儿子和丈夫忙碌，此时在黑暗中她终于得以独处，但她却无比抗拒这一“癫狂的自由”，“心里模糊地觉得不行，不行！”黑夜模糊了万物的界限，在太阳的光芒和热度中可知可感的事物在夜晚都变得捉摸不透，附上了神秘的力量。没有了工作、家庭、人际交往，独处的阿小因为暴风雨和夜晚，不得不直面心灵深处被埋藏的彷徨。对于阿小来说，暴雨和黑夜激发了她对自己生命残缺之症的认知。作为女性，她努力地生活，赚钱养家，但她对情感的需求却并没有得到满足；她拥有勤奋坚韧的美好品质，比她迂腐无能的丈夫、生活放浪的主人有着更纯净的道德，却只能以这些男子为中心不停地忙碌、奉献。她努力融入现代大城市的生活，渴望得到都市群体的认同，却始终是城市的底层人、边缘人，一切“要强”不过是徒劳。阿小生命的悲剧正在于此：看似忙碌、充实，拥有了“都市女性”的身份；实则寂寞、苍凉，在边缘和角落挣扎辗转。暴风雨的夜晚打破了虚构出的“认同”。阿小发现了自己被压抑的空虚，感到恐惧又无所适从。

在这“癫狂的自由”中，阿小看见了真实的自己，也看见了真实的城市。和小说开头的“连天也背过脸去”相呼应，此时“天忽然回过脸来，漆黑的大脸，尘世上的一切都惊惶遁逃。”生活在城市底层的阿小，在白日里看见的是繁华都市的背面，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勾勒正面的纸醉金迷；到了夜晚，城市终于向阿小转身，展露出自己漆黑而恐怖的真实面孔。张爱玲别出心裁地在这一夜铺设了三条线：一是纵情声色的哥儿达与舞女，二是约会不成的阿小，三是楼上争吵的新婚夫妻。哥儿达和舞女是时髦男女的代表，他们畸形、放浪的生活正是阿小向往的大都市文化的产物。小说形容喝醉了的舞女“透明透亮地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鬃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在这样的生活中女人被完全物化。阿小在白天夸耀新婚夫妻的排场，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到了夜晚，这对夫妻刚结婚三天便争吵不止。无论是哥儿达还是楼上的夫妻，这些城市男女都在这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尽情宣泄自己白日被压抑的欲望。这里的“欲望”是情欲、破坏欲，是人心的负面力量。阿小用忙碌的工作掩盖自己的空虚，城市男女则用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此刻，生命光鲜亮丽的外表被撕裂，残酷、丑陋的真实浮出水面。正如张爱玲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4 结语

哥儿达和舞女、楼上的夫妻、孤独的阿小三方互为对照，让读者窥得众生相的冰山一角。暴雨夜的城市去除了白日的掩盖，变得恐怖、混沌、癫狂，而这就是阿小生活的、并努力想要融入的环境。至此，张爱玲构建出了一则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丁阿小”们的生存状态寓言。小说的开头以炎樱的一段文字作引言：“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1]夜与白天是一首歌中不同的声部。夜晚象征着欲望、疯狂、非理性，是对白日秩序的脱离，是灵魂深处真实的揭示。楼上的新夫妇在夜晚争吵不止，到了第二天白天，却又恢复正常，仿佛无事发生，照样招待客人。夜晚暴雨中迷茫恐惧的阿小，到了白天，又是忙碌、骄傲、能干的阿小。“空虚”被压抑、释放、再压抑，热冷循环不止。一首人生的“秋之曲”在张爱玲笔下如生命轮回般不断上演。

阿小的生存困境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女子来到大城市后面对的生活难题，更是时代的产物。张爱玲构建的生存寓言，不止属于“丁阿小”们，同样属于生活在大城市的男男女女。《传奇》增订本的封面上画着这样一幕：晚清着装的女人在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奶妈抱着孩子。在其乐融融的画面

中，突兀的是窗外有个巨大的、不对称的蓝色人形，在饶有兴致地往窗内窥看。这一奇怪的、让人不舒服的人形象征着舶来的“现代性”，而晚清女子则象征着前现代的遗存。作者和读者都在用现代的思维去关照着充满矛盾的世界，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现代性”凝视的对象。对彼时的中国来说，“现代性”是一个难以言状的、让人恐惧的存在，却又不可忽视。人们一方面害怕它、抗拒它，一方面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去承认它的存在，迎接它的到来。40年代，沦陷后的上海成了一座战时的经济、文化、军事“孤岛”。在这座看似繁华如常的孤岛上，传统与现代性被时代的巨力推挤着交汇；而在被这巨力撕裂出的缝隙中，人们看不见明天，艰难地寻找着生命的主体。《桂花蒸·阿小悲秋》呈现出的苍凉与空虚，属于阿小，也属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属于大时代中迷茫的一代人。

参考文献

- [1] 高全之.错误示范——《桂花蒸·阿小悲秋》的版本讨论.张爱玲学续篇[M].麦田出版社,2014,53.
- [2] 张爱玲.传奇[M].山河图书公司.1946.
- [3] 林奕伽.他者凝视下的女性焦虑——浅析《桂花蒸·阿小悲秋》的女性欲望[J].大众文艺,2021(20):17-19.